

# 敦煌寺院文書與唐代佛教文化之探蹟

## —以四月八日佛誕節為例

鄭阿財\*

### 一、前言

寺院是佛教的實體，唐代佛教寺院作為一個兼具宗教、政治、經濟等職能的社會組織，發揮了多方面的功能，尤其在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上，堪稱是當時社會的文化中心。

唐代的寺院今天很少保留，唐代寺院活動的具體實況也少有紀錄流傳下來。不過，絲綢之路的佛教聖地敦煌莫高窟卻保存有相當多的唐代及唐以前的石窟寺院；同時 1900 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約六萬件四世紀到十一世紀的寫本文獻，是當時社會文化的原始記錄，這些文獻在偶然間封藏，更在偶然的狀況下被發現。這些不經意的保存，絲毫未經後人加工改造，可說是中國中古時期文化的活化石，中國中古社會生活的時空膠囊。

佔全部文獻百分之九十的佛教文獻中，除了經、律、論等佛教典籍外，同時也有為數可觀的唐五代寺院文書，這些更是當時佛教寺院活動的全紀錄，為我們研究唐代寺院文化提供了具體而寶貴的一手材料。

寺院活動以其信仰內容為主體，隨著佛教的東傳，在中國佛教文化中形成了佛誕日、臘八節、盂蘭盆會等重要節日，不但是佛教的重大節日，也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民俗。這些重大節日，照例在寺院都會有相關的活動。尤其是佛誕節，自然備加重視，隆重慶祝，廣為宣揚，是寺院文化重要的一環。1988 年羅華慶有〈9 至 11 世紀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動〉<sup>1</sup>簡述敦煌的形像與浴佛活動，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sup>2</sup>對漢魏六朝以來「佛誕日」的情形也多有探討，譚蟬雪

---

\* 南華大學文學系教授兼敦煌學研究中心主任。

<sup>1</sup> 羅華慶：〈9 至 11 世紀敦煌的行像和浴佛活動〉，《敦煌研究》1988：4，1988 年 11 月，頁 98-103。

<sup>2</sup> 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948-952。

《敦煌歲時文化導論》<sup>3</sup>對敦煌歲時民俗文化有系統的論述，其中有關二月八日行像與四月八日浴佛多所論述。張耀方碩士論文在譚蟬雪《導論》系統上，有所論述。<sup>4</sup>本文在前賢基礎上，擬以敦煌文獻中的寺院文書為核心，結合相關的文獻記載，嘗試著去勾勒「佛誕節」在寺院活動的具體情形及其相關的文化意涵。既高舉前修，亦竭駢管，千祈一方案，有以教之。

## 二、敦煌地區的佛誕節日

佛陀誕生，根據佛典記載說：摩耶夫人因夢白象入胎而懷孕；分娩前，手攀無憂樹，世尊便從其右脅降生，且東西南北寺向各自行走七步，步步生蓮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於是天女散花，九龍吐水。這些記述內容不但影響到後世佛誕浴佛習俗的形成，也衍生出豐富的文學與藝術作品。

漢傳佛教關於釋迦牟尼的生日說法不一。有主張佛生日在二月八日，有主張在四月八日<sup>5</sup>。「二月八日」佛誕說在釋門雖有信從者<sup>6</sup>，但「四月八日」說的影響更大，中國中古時期南北各地的寺院普遍信從。根據《唐會要》卷五十所載：

天寶五載二月十三日，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大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從之。<sup>7</sup>

這則內容也見載於《唐會要》卷八十二，「休假」項下。<sup>8</sup>可見唐玄宗天寶以來，唐代官定的節日假中，已明確規定四月八日給假一天。又顧況（727-815？）〈八月五日歌〉中稱：「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sup>9</sup>將佛誕節與唐玄宗誕辰的千秋節相提並論，也顯見唐朝官方規定四月八日為佛誕日。

敦煌地區的佛誕日，有以為二月八日，有以為四月八日。按：「二月八日」敦煌地區有盛大佛事活動，然主要為「行像」，每年正月中下旬開始，寺院便忙於修治佛像、造作頭冠、縫製幢傘；民間「行像社」則開始選定擔像、拽像、擎像人夫，展開行像準備工作。二月六日，諸寺燃燈，正式開始佛誕節活動。二月

<sup>3</sup> 譚蟬雪：《敦煌歲時文化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12月，頁147-157。

<sup>4</sup> 張耀方：《敦煌文書所見唐代節慶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sup>5</sup> 見《大宋僧史略》卷上《佛降生年代》，《大正藏》卷54，頁236。

<sup>6</sup> 《續高僧傳》卷22《玄琬傳》：「（隋京）延興寺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唯舊緒，敬崇浴具，每年此旦，來講設齋。」

<sup>7</sup> 見《唐會要》卷五十，「雜記」項下。

<sup>8</sup> 見《唐會要》卷八十二「休假」：「（天寶）五載二月十三日，中書奏：大聖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請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時，休假一日。陳希烈奏。」

<sup>9</sup> 顧況：〈八月五日歌〉，載《全唐詩》卷二六五，頁2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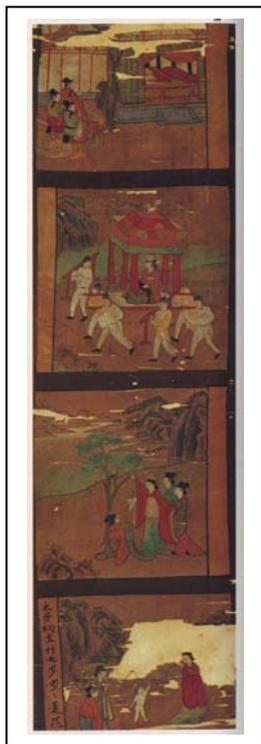
八日，行像活動正式展開，各色侍佛人抬佛塑像、擎佛畫像，自北門出發，巡行街衢，百姓臨街瞻仰，散施祈福。活動熱鬧非常，然並無浴佛活動，可見敦煌地區以二月八日為佛逾城出家的紀念日，而非佛誕日。

另外，敦煌寫本《太子成道變》、《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八相變》…等十種據《佛本行集經》演繹佛傳故事的變文，不但反映出佛傳故事在當時流行的實況，其中有關四月八日佛誕的情節內容，更是多所鋪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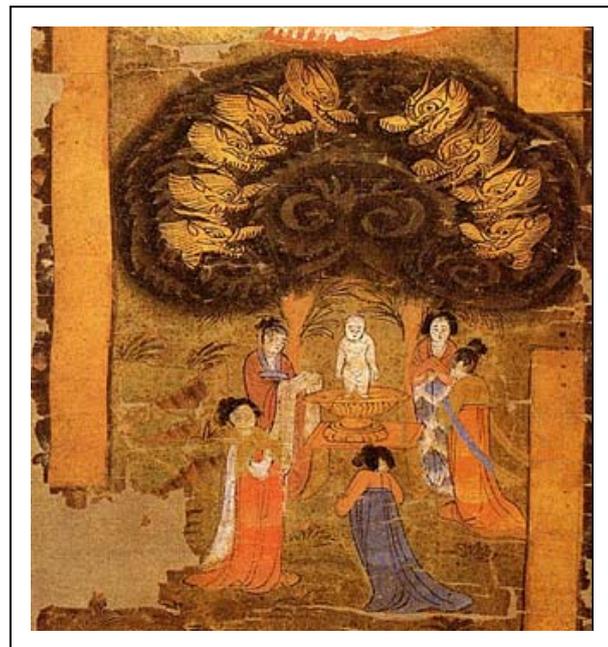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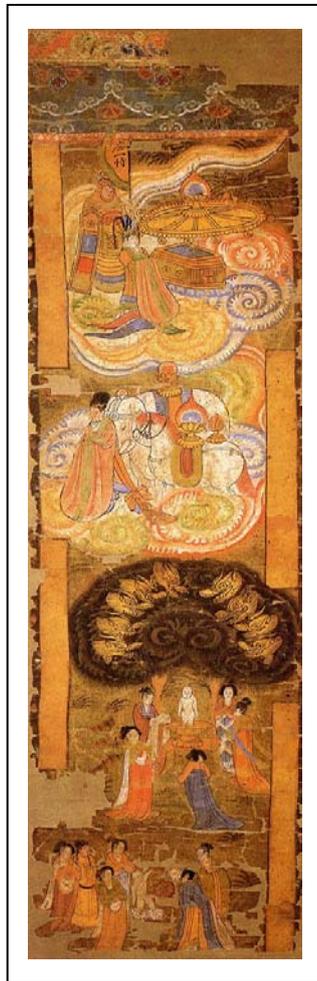
除了《佛本行集經》一類經典，及訴諸於語言文字的變文、佛曲歌讚外，更透過線條、色彩等形像在雕塑、繪畫等藝術作品來呈現，對民眾的影響以及佛誕浴佛民俗形成自然深入。

在中國關於佛誕內容的圖像創作，北魏時期已經相當盛行，例如雲岡石窟第六窟後室，方形塔柱四面大龕兩側和窟東、南、西三壁，以及明窗兩側，浮雕釋迦牟尼自誕生到成道的故事。在第二十窟以西小窟也有佛誕故事的浮雕。浮雕中的容顏、服裝、場景等等，已表現出中國化的風格傾向。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長安菩提寺東壁、化度寺內，及東都洛陽聖慈寺，都有佛本行經變壁畫。今存敦煌石窟壁畫、絹畫中也可見到更多具體生動的佛陀誕生內容。敦煌石室舊藏為數可觀的唐、五代彩色絹幡，上繪佛像、菩薩像、佛傳圖…等等，現大多收藏在大英博物館及印度博物館中，其中頗有相關的精彩內容。如印度博物館藏品中（見下圖），有一長條絹幡，自上而下分成四格，分別描繪燃燈佛送釋尊到摩耶夫人寢宮入胎，夫人乘轎出遊藍毘尼園，夫人右手攀無憂樹，釋尊自右脇降生，釋尊降生行走七步，步步生蓮，手指天地，開口言語等情節。畫中屋舍、轎子、人物穿著等，均為唐代風貌。



另外，在大英博物館藏品中（見下圖），也見有長幡絹畫，正中畫太子降生，上有九龍吐水，旁有執衣巾的宮女，下方則畫太子行步生蓮，手指天地的情節。



至於敦煌壁畫，莫高窟 290 窟北周時期窟，人字披東披上段，繪有摩耶夫人手攀樹枝，太子從右脇出生、行步生蓮，手指天地、九龍灌頂等畫面。61 窟五代時的石窟，南壁下部畫有摩耶夫人在藍毗尼園生下太子的情景；西壁則畫有太子行走步步生蓮，九龍灌頂，諸天為太子供養，以及大臣摩訶那摩從藍毗尼園回迦毗羅衛城擊鼓報喜，淨飯王與諸大臣聞鼓聲震天，召見摩訶那摩，記錄太子降生種種吉祥之事。另外，如 76 窟宋代重繪以及西夏營造的安西榆林窟第 3 窟、肅北五個廟石窟第 1 窟也都見有佛誕情節壁畫。這些都說明了敦煌地區從北朝到唐宋，佛誕故事始終流行不替，而佛誕日的紀念活動與浴佛的文化，似乎也在此氛圍下形成。

至於敦煌寺院文書中有關記載四月八日佛誕的寫卷，則以敦煌研究院藏編號 007 號《大慈如來十月廿四日告疏》為最早。這件寫卷是 1944 年敦煌藝術研究

所從莫高窟中寺（土地廟）佛像肚中所獲得的文獻之一。這批文獻經學者研究認為也是出自於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經洞的文獻。這件寫本長 37.1 公分，高 21.9 公分，存 18 行。有題記作：「興安三年五月十日譚勝寫。」按：「興安」為北魏文成帝年號，興安三年，是西元 454 年。其內容如下：

大慈如來十月廿四號 告疏  
 告閻浮地內諸眾人民：長為□  
 九年頭。應著勾蘭袈裟。濟渡□  
 散。住高繩銀坐，汝等人民盡是吾子□  
 衣服。四月八日，常出教化。諸眾生悉□  
 布施一滄受戒者，盡聽見吾功德□  
 是報。答得吾書，隱而不傳者，死入地□  
 有脫期答傳與他人者，即得無量無□  
 □賢者見之莫停，吾不避遠近□□  
 勒佛，一心敬禮，稱十方諸佛。一心牟尼佛，白□  
 稱世尊，一心禮拜，稽首和南。言吾去世後，一  
 坐。奴為沙門，婢為尼僧。五道應亡，留□□傍  
 彌勒，貪王污吾形體，毀經法時，閻浮地□  
 教化。河東河西，當各出神，永治一億人。爾時□  
 為普修佛法者，門無斯役。若有問知者，庶□  
 莫使斷絕，功德無量。告諸賢者，咸使問□  
 出洽百病。  
 興安三年五月十日譚勝寫  
 傳教人願生生之處，長直彌勒。

這件北魏興安三年（454）五月十日譚勝寫的告疏，是敦煌文獻中唯一一份告疏，所反映的是北魏時期民間的彌勒信仰，為少見的民俗資料。所謂慈心就是與人以樂之心，正因彌勒修得此心，所以彌勒又名慈氏。閻浮提為梵文之舊稱，新稱瞻部洲，即人類居住之處。這是以彌勒現身說法，要求傳教者在四月八日教人化惡為善，說明北魏時敦煌地區的佛教寺院已經有佛誕節活動的進行。

又英藏 S.8344〈四月八日文〉，也是佛誕節的齋文，以駢文形式在佛誕法會轉讀。內容對於佛陀誕生時，九龍吐水等情形，多有記敘：

竊以：釋迦大聖，修萬行而證三身；調御應真，懇六度以成四智。無數大劫，捨國城，離妻子，七珍果滿功充，遇然燈佛親承受記，從此往生兜率，化億兆之天德；思念凡間，拔死生之重苦。迦羅衛國，是千佛之遺蹤。淨飯大王，種百生之善本；摩耶聖后，曠劫結無量勝因；下降閻浮，脫胎於夫人腹內。時當四月八日，鸞駕遊嵐毗尼園無優（憂）樹前，攀枝而誕生太子，遂感九龍吐水，沐金色清淨

之身；七步蓮開，舉手稱三界之尊；黃鶯轉樹，爭吟喜聖之歌；蝴蝶熒空，競引蓬仙之舞。毛群羽族，總百億而周瞻；神宇天宮，直三千而率奉。自後君神仰化，道俗歸依，報佛無恩之知會也。伏惟我府主大王。

這是敦煌地區四月八日最重大的佛誕法會，齋會中寺院法師照例要轉誦「願文」，功德主當然是敦煌地區當時的最高領袖，所以最一句便是「伏惟我府主大王」作結。按：敦煌文獻中出現敦煌地區稱「大王」的，主要以「瓜沙州大王」為多，如北 0073《普賢行願王經》內有：瓜沙州大王印（朱色方形）；北 0616《佛說佛名經》：題記：「敬寫大佛名經貳佰捌拾捌卷，伏願城隍安泰，百姓康寧，府主尚書曹公已躬永壽，繼治長年，合宅枝羅，常然慶吉，于時大梁貞明六年歲次庚辰五月十五日記。」有「瓜州大王印」；S.1181〈結壇歸願文〉有題記：「道興念記□□僧官道□念記」長興二年(公元 931)十二月廿六日弟子河西歸義等軍」卷內有河西節度□□大王、河西都僧統和尚、指撝尚書、閩都衙、董都衙等官名。法藏 P.2733 更有〈曹大王禮佛疏〉又 P.2761〈祈禱文〉內容也提及「大王及涼國夫人」。很可能指的是歸義軍節度使索勛的女婿，張議潮的外孫婿後梁乾化四年（914）後掌政瓜州的曹議金，龍德二年（922）稱「托西大王」，據 P.2047 寫卷，知清泰元年（934）稱「歸義軍節度使令公大王」。又曹議金為莫高窟第 98 窟窟主，三界寺道真《臘八燃燈分配窟龕名數》稱此窟為「大王窟」。

又 S.2832《釋門應用文》「十二月應時文」中也有：「四月八日：時屬四月維八，如來誕時，七步蓮花。既至於日，九龍吐水，亦在於茲辰」。足見四月八日浴佛是從北朝到唐五代敦煌地區佛教民俗活動的常態，因此，才會採以為應用文書的時節應酬語；也證明敦煌地區得佛誕日採取的是四月八日。

### 三、唐五代敦煌佛誕節的寺院文化

至於四月八日佛誕節在寺院中更有法會、齋會、浴佛等重大活動，同時信眾們在此盛大節日中，也多以造幡、寫經等行動來展示他們的信仰。這些活動主要是在寺院內所從事的佛教信仰活動，也是寺院文化的一種呈現。根據敦煌寫本通俗讀物《雜抄》一書中，對於唐代各個節日的起源與活動都有記載，從這本書的性質我們可以得知內容所載的都是當時民間最為流形的民俗。其中提及四月八日的情形說：「四月八日何謂？天子太子初生之日，廣會聖眾，設齋供養」。<sup>10</sup>以下分別就「廣會聖眾，設齋供養」、「浴佛」、「造幡」、「寫經」等四月八日佛誕節行事所形成的寺院文化，透過敦煌寺院文書，進行簡要的論述。

<sup>10</sup>《珠玉抄》又名《雜抄》、《益智文》，今所知見計有：S.4664、S.5658、S.5668、S.5755、S.9491、P.2721、P.2816、P.3393、P.3649、P.3662、P.3671、P.3683、P.3769、P.3906 號等十四件寫本。詳參鄭阿財、朱鳳玉合著：《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165-193。

## 1. 廣會聖眾，設齋供養

從魏晉以來，便有四月八舉行大法會之俗，如上述的龍華會、劉薩訶的大會平原及齊高祖的齋會等，P.2081 號《不知名佛經》〈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功德法第五〉：

聖人出世，託齋有時。是以《因果經》云：如來於四月八日夜明星時，降神母胎。……但寺捨隘狹，或復僻遠，行者供養，或不同普。自今已後，諸佛弟子道俗眾等，宜預擇寬平清潔之地，脩為道場。於先一日各送象集此，種種伎樂香花供養，令一切人物得同會行道。若俗人設供請佛及僧，易於是日通書白知。至於明旦日出時，四眾侍衛，隨緣應供，設供壇主與其眷屬，執持香花，路左奉迎，恭敬供養，如法齋會，如是齋畢，然後還寺。

轉誦「齋文」、「發願文」是佛教法會、齋會必不可少的一個主要項目之一。四月八日教主釋迦牟尼誕辰是重要的紀念日，「齋文」、「願文」更是居於敦煌佛教齋願文的重要地位。當四月八日佛誕節廣會僧眾，設齋供養，齋會進行中，必有齋文，法藏 P.3103 〈浴佛節作齋事禱文〉殘篇，全文蓋以駢文撰寫，道出浴佛佳辰，洗僧良節，齋會的盛況：

方今三冬季序，八葉初辰；飛烟布而休氣浮，日重輪而月抱戴。欲令家國延久，陰陽不愆，冀佛日而恒明，願法輪而常轉。彰仁王以無為而化物，示黎庶憑福智以修身。宣傳不絕於龍沙，傳授無虧於柰苑。所乃效未生怨之盛作，襲祇域王之芳蹤。爰當浴佛佳辰，洗僧良節。而乃澄清神思，仰百法以翹誠；除滌籠煩，趨大乘而懇切；繇是求僧側陋，置席蓮宮；導之以闔境玄黃，率之以傾城士庶。幢幡晃炳，梵贊訇鏘，論鼓擊會壑填，法旌樹而場駢塞。而以法施無竭，唯直出於人天；財捨有窮，能資持於福祿。是即捧金爐而香添五分，披訴情誠；合玉掌而花散四蓮，獻陳珍異。美矣盛矣，休□□□（哉善哉）！塵沙易算於垠（以下殘缺）

又在四月八日佛誕日前三日，敦煌官府和都司組織所有出家五眾舉行轉經大會。英藏 S.3879 《乾祐四年（951）四月四日應管內外都僧統帖》載：

〈應管內外都僧統 帖〉：

諸僧尼寺綱管所由等。右奉 處分，今者四月大會，准常例轉

念三日，應有僧尼大眾，除枕疾在床，餘者總須齊來。一則功德圓滿共報佛恩；二乃薦國資君，廓□河隴。同發勝心，莫違上願。限五日早晨，並於報恩寺云集，不得一前一後。再勸齊來，更是自家福份。其帖仰倉司就（？）寺丁寧告報。如有故犯，前或不齊同者，責罰取此不輕。毡褥准陽，香花□葉，不令闕少一色。諸寺寺宇掃略，不令違犯者。右仰准此指搗，不得違犯者。  
乾祐四年四月四日。應管內外都僧統金光惠。

S.3879 這件帖是河西最高的僧官，也是河西佛教界的最高領袖都僧統下發各寺綱管所由的文書，內容是通知所有僧尼在四月五日早晨前往報恩寺參加所謂的「四月大會」，大會的主要內容是「准常例轉念三日」。這件帖的開頭稱「右奉處分」，在敦煌地區當時能夠處分都僧統的只有歸義軍節度使，可見這個四月大會應該是由官府和歸義軍時期河西佛教事務的行政機構都僧統司共同組織的。

這件帖雖然沒有記載四月大會的緣由，不過，同一寫卷還保存有另外一件《都司帖稿》，這件抄寫在〈應管內外都僧統帖〉的後面，內容相同，同記一事。只是前面的〈應管內外都僧統帖〉有鈐印章，是一件實用文書，後面的《都司帖稿》則有多處修改、塗抹，應該是僧統帖的稿件。郝春文以為：唐五代敦煌地區都司設置方等道場時，既有由都僧統簽發的《都僧統榜》，又有專門負責方等道場的機構道場司簽發的《道場司榜》。准此，上錄後一件文書應是都司專門負責「四月大會」機構所發之帖的文稿<sup>11</sup>。

這件《都司帖稿》中明言四月大會的緣由是為了紀念「釋迦降誕之辰」。內容說明如下：

右奉處分。今者四月八日是釋迦降誕之晨，大會轉經，僧尼切須整齊，除卻染疾患臥，餘者老小不容，於時赴會齊來。一則為報佛恩，二乃薦國資君。各各念誦，遂見風調雨順；個個澄心蓮府必獲康寧。不得違越上願，限至五日早晨於報恩寺雲集。整齊威儀，雍雍而來。不許一前一後，失於軌範。若有不稟條流，面掃裝眉，納鞋赴眾，髮長逐伴者，施罰不輕。今遣倉司遞帖先報。

從上面《都僧統帖》可見紀念釋迦降誕的四月大會是「准常例轉念三日」，既是「常例」，可見這是每年都要舉行的。而「轉念三日」，也就是從四月五日至四月七日連續轉經三天，為四月八日佛誕日的活動暖場，到了四月八日佛誕日正日，則是官府與佛教界正式慶祝活動的高潮。S.4632《乾德六年（968）歸義軍節度使敦煌王曹元忠疏》證明四月八日時確有活動，其內容如下：

謹請西南方雞足山賓頭盧頗羅墮上座 和尚

<sup>11</sup> 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頁。

右今月八日，南瞻部洲薩訶世界大宋國沙州就諸寺敬設大會，伏願  
大聖誓授佛教，不捨倉（蒼）生，興運慈悲，依時降駕。謹疏。  
乾德六年四月 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敦煌王曹元忠疏。

這件疏的時代雖然是北宋時期，但卻是以歸義軍節度使敦煌王曹元忠的名義發出的告疏，疏中雖沒紀錄諸寺敬設大會的緣由，但從其時間在四月八日，結合上面〈應管內外都僧統帖〉等，可推知整個活動都是紀念佛誕日，只是活動盛大，為時四天，轉經活動是每年舉行的「常例」，因此稱之為「四月大會」。就上面所舉的寫卷，四月大會的日程安排是：五日集中，六、七、八三天轉經念誦，地點就在報恩寺，這與大會的目的報佛、薦國相吻合。大會有嚴格的要求：所有僧尼除重病臥床者外，其餘一律參加，並要儀容整潔，列隊前往，秩序井然。同時所有寺院需打掃衛生，乾乾淨淨過佛節。

每年四月的佛誕大會，乃佛教界的盛事，在正式活動高潮四月八日的佛會，同時也展開賢聖道俗貴賤上下無遮，平等行財法二施的「無遮大會」。S.3050《善惠雪山修道文》中便有：

王舍大城，有一大富長老，常年四月八日設個無遮大會，供養八  
萬個僧，並是恒聲音（喑）啞無數，各布施五百文金錢……。

這說明了佛教常年在四月八日設有無遮大會，供養僧人。敦煌地區也在四月大會進行布施。P.2668《新菩薩經》後有「乙亥年四月八日翟奉達七言詩二首」，詩前有小序：「乙亥年（615）四月八日布衣翟奉達，因施主請來，故造短句而述七言，如男慶豐同來執硯」字體拙劣，係硬筆所寫，字跡與前《新菩薩經》同，顯非翟奉達手跡，當是學童或小沙彌所抄。從這也可得知敦煌每年佛誕日的四月大會中，從官府到百姓，均可行大施捨，供養僧人。

## 2. 浴佛

四月八日佛誕日盛大的法會與齋會之中，「浴佛」的活動更是重要的節目。佛陀誕生的故事不僅是寺院壁畫、幡具等的繪畫內容，也是形成寺院乃至社會文化活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具體的表現便是「浴佛」的習俗。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洗僧部第八」：

又《摩訶剎頭經》，亦名《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天下人民：十方諸佛，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生，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去家學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得佛道，皆用四月八日夜半時般泥洹。佛言：所以用四月八日者，為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

不熱，時氣和適。今是佛生日，故諸天下人民共念佛功德，浴佛形像，如佛在時，以示天下人。……四月八日浴佛法：時當取三種香：一都梁香，二藿香，三艾納香。合三種草香，按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者，可以紺黛秦皮權代之。又用鬱金香，手按漬之於水中，按之以作赤水。以水清淨用灌像訖，以白練拭之。斷後自占更灌，名曰清淨，其福第一也。<sup>12</sup>

「浴佛」又稱「灌佛」，雖源自印度，但印度是平時爲之，在中國則以農曆四月八日佛誕當天舉行。四月八日浴佛有兩重含義，一是象徵性地再現佛誕生時的九龍吐水；二是表達對佛的懷念之情。

佛教傳入中國後，以浴佛來紀念佛陀誕辰，始於東漢末年徐州浮圖祠的浴佛行事<sup>13</sup>。東晉鎮北將軍彭城（即徐州）人劉牢之有子敬宣，幼年喪母。每逢「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sup>14</sup>。《高僧傳·佛圖澄傳》記載，石勒的稚子多養於佛寺，「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sup>15</sup>。梁·宗懷《荊楚歲時記》曰：「四月八日，諸寺設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龍華會。」

S.6537 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清楚的記載唐代四月八日浴佛的節儀，說：

四月八日賞餠糜，浴佛行道。

鄭餘慶《大唐新定吉凶書儀》一部並序，結銜作：「銀光清陸大夫吏部尚書兼太長卿」，可見這是一部代表官方編定的書儀。「四月八日賞餠糜，浴佛行道。」鄭餘慶（748-820），字居業。大歷中舉進士第。貞元初，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憲宗時，爲尚書左僕射，詳定典制。此書約編撰於元和五年（810），成於元和七年（812），是一部當時盛行的綜合類書信參考文範，在書儀系統上具有其一定的地位，影響北宋司馬光的《書儀》。這條記載，雖然短短 11 個字，卻也明示唐代官方對四月八日節日的認可，同時也提示四月八日佛誕節的具體活動項目與施食的民俗。

P.2940《齋琬文》中，更有文字駢麗，詞藻華美的「王宮誕質」：

四月八日，斯乃氣移琬律，景絢朱躔。祥風蕩吹於金園，瑞日融輝於寶樹，萸舒八葉，搖翠影於周霄；桂寫（瀉）半輪，掩浮光

<sup>12</sup>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大正新修大藏經》53卷，頁543a-543b。

<sup>13</sup> 《三國志》卷49《吳書·劉繇傳》：“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

<sup>14</sup> 《宋書》卷47《劉敬宣傳》。

<sup>15</sup> 《高僧傳》卷9《佛圖澄傳》，第384頁。

于魯夕。池花含秀，十方開捧步之蓮；天雨流芳，九龍灑濯襟之液。  
 恒星落耀，珮日揚輝。味甘露以凝茲，蓋鮮雲而颺影。黃鶯轉樹，  
 爭吟聖喜之歌；素蝶縈空，競引蓬山之舞。毛翔羽族，總百億而同  
 瞻；神境天宮，亘三千而率舞。

誕質，意謂生成形體。王宮誕質即佛陀悉達太子於王宮降生。琬律即玉律，「氣移琬律」，說明斗氣在轉移、變換。而「景絢朱躔」日月星辰運行正是照耀在朱明的時候，也就是夏季的第一個月，四月。「莫舒八葉」是指初八之日<sup>16</sup>。文中還反映了佛誕生時的祥瑞：七步生蓮花及九龍灑水，值此盛節，天上人間齊慶賀。《齋琬文》是具有釋門雜文、齋文程式、願文範本的功能，實際上是佛教齋事活動的規範與總綱領。<sup>17</sup>文體以駢體文為主，講求駢四儷六的對句與聲律，選擇詞藻華麗，以便轉誦時琅琅上口。

### 3.、造幡

在四月八日此一特殊的紀念日裡，信眾個人也還透過「造幡」來表達心中的祈願與追薦亡者。在佛教「幡」與「幢」同為佛菩薩之莊嚴供具。幡是總稱，原為武人在戰場上用以統領軍旅、顯揚軍威的旌旗，佛教則取之以顯示佛的威德，而信眾也以立幡來表達祈福的願望。

敦煌研究院藏 343 號《造幡發願文》寫卷：

皇興二年（四六八）四月八日，歲在戊申，清信士康那造五色幡四十尺，上十方諸佛，發精誠之願……願眷屬所生值遇諸□（佛），□（得）聞經法，信解妙旨，朗悟道場，棄惡入善，三宗為正，史無耶（邪）念。與七世父母、現在眷屬、內外諸親，並無□□，齊均信向，共成菩提，是那著□（幡）之所至願。

S.4162《優婆塞戒經》卷二尾記：

仁壽四年（六〇四）四月八日楊維珍為亡父寫《優婆塞經》一部、《灌頂》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問事》一部，造觀世（音）像一軀，造卅九尺幡，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

<sup>16</sup> 《竹書紀年》卷上：「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歷莢。」蓂莢為傳說中的瑞草。每月從初一至十五，每日結一莢；從十六至月終，每日落一莢。所以從莢數多少，可以知道是何日。當蓂草長了八莢，即初八。

<sup>17</sup> 參見王書慶〈敦煌文獻中的齋琬文〉，《敦煌研究》1997：1，頁141-147；王三慶〈敦煌本《齋琬文》一本研究〉，《第三屆中國唐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唐代學會編輯委員會編輯，中國唐代學會，1997年，頁17-67。

《灌頂經》卷十二：

我今當勸請眾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懸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幡。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命幡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  
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色神幡，然四十九燈。<sup>18</sup>

幡的形狀，一般由三角形的幡頭、長方形的幡身、置於幡身左右的幡手，及幡身下方的幡足構成。通常是以布製成。懸掛的場所，有時是堂內柱上，有時豎立在佛堂的前庭。造幡有降魔、延壽等種種福德。

#### 4. 寫經

佛教倡導抄造經典的法供養，鼓吹抄造佛經於人於己皆可獲殊勝功德。早期佛教經典中便有不少強調供養功德的，有強調出家功德的，如《出家功德經》、有鼓吹造塔功德的，如《佛說造塔功德經》，有鼓吹造像功德的，如《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也有鼓吹浴佛功德的，如《浴佛功德經》……，多是以專經為名。<sup>19</sup>也有於各經中部分章品隨緣提倡各種功德，如《道行般若經》卷二〈摩訶般若波羅蜜功德品〉第三：

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持經卷自歸作禮，承事供養，名華、搗香、澤香、雜香、繒綵、華蓋、旗幡，得福多。<sup>20</sup>

還有經文中顯示受持功德的內容，《法華經》卷四〈法師品〉第十云：

若有人問：何等眾生於未來當得作？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伎樂、合掌恭敬，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哀愍眾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妙法花經》，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sup>21</sup>

<sup>18</sup> 見《大正藏》卷 21，頁 535b。

<sup>19</sup> 參梁麗玲：〈六朝敦煌佛教寫經的供養功德觀〉，《敦煌學》22，1999 年 12 月，頁 119-138。

<sup>20</sup> 見《大正藏》卷 8，頁 432c。

<sup>21</sup> 見《大正藏》卷 9，頁 165c。

內容皆特別強調供養佛經的無量功德，不但於現世可救苦祈福，未來又可往生佛國淨土。此外，尚有《首楞嚴經》、《賢劫經》、《方廣大莊嚴經》、《大方等大集經》、《金光明經》……等大乘經典中均見有大力鼓吹寫經功德的，因此，可以說「寫經」已經成為佛教信仰文化的一部份。他的風氣源遠流長，盛極一時，尤其在雕版印刷尚未普及時，更蔚為一種特有的供養模式。即使在雕版印刷盛行後，基於宗教信仰的祈願，抄造經典依舊相仍不替。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為數六萬件的寫卷，百分之九十以上為佛教文書，其中經律論三藏居多，然依其性質而論，不外乎一切經、日常用經與供養經三類。其中供養經數量最大重複性最高，即是寫經功德的推動所致。以下僅將敦煌寫卷中有關四月八日抄寫佛經的寫卷，依照題記年代先後條列如下，以資參考。

S.2724《華嚴經》卷第三尾題：

大魏正光三年（522）歲次壬寅四月八日寫訖。

大谷 50《佛說普門品經》一卷(大谷:餘乙一四號)，題記：

永熙元年（533）歲次壬子 四月八日，訖。弟子受押。

散 0707《寶梁經》，題記：

永熙二年(534 )歲次壬子 四月八日訖。

散 0871《大般涅槃經》，題記：

大統二年(536 ) 四月八日。

S.2724《華嚴經》題記：

夫妙旨無言，故假教以通理，圓體非形，必藉口以表真，是以亡兄沙門維那慧超，悟財命難恃，識三聖易依，故口資竭賄，唯福是務，圖金容於靈剎，寫冲典於竹素，而終功未就，遷異世，弟比丘法定，仰瞻遺跡，感慕遂甚，故瑩飾圖剎，廣寫眾經：《華嚴》、《涅槃》、《法華》、《維摩》、《金剛》、《般若》、《金光明》、《勝鬘》，冀福鍾亡兄，騰神梵鄉，游形淨國，體悟無生，早出苦海，普及含靈，齊成正覺。大魏正光三年(552)歲次壬寅四月八日擲(寫)訖。

S.4020《思益經》，題記：

大隋開皇八年(588)歲次戊申四月八日，秦王妃崔為法界眾生敬

造《雜阿含》等經五百卷，流通供養。員外散騎常侍吳顯華監，襄州政定沙門惠曠校。

S.2791《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六尾題：

大隋開皇八年(588)四月八日清信女汜仲妃自知形同泡沫、命等風光，識解四非，存心三寶。遂減身口之文。為亡夫寫《涅槃經》一部，以此善因，願亡夫遊神淨土；七世父母、見在家眷，西生之處，值佛聞法。天窮(穹)有限，地極無邊，法界有形，同登正覺。

S.2154《佛說甚深大迴向經》題記：

大隋開皇九年(589)四月八日皇后為法界眾生敬造一切經。流通供養。

P.2413《大樓炭經》，尾題：

大隋開皇九年(589)四月八日，皇后為法界眾生，敬造一切經，流通供養。

S.227《大智論釋》卷第四十一，尾題：

開皇十三年(593)歲次癸丑四月八日弟子李思賢敬寫供養。

按：同一題記也見於 S.457《大智論》卷第四十四、S.5130《大智論》卷第四十六、S.4967《大智論》卷第四十七、S.4954《大智論》卷第五十、P.2199《大智論》卷第五十一、散 1057《大智度論》卷第六十二等寫卷的尾題。顯然是李思賢敬寫供養《大智論》同一部的不同卷次。

S.4162《優婆塞戒經》卷二，尾題：

仁壽四年(六〇四)四月八日楊維珍為亡父寫《優婆塞經》一部、《灌頂》一部、《善惡因果》一部、《太子成道》一部、《五百問事》一部，造觀世(音)像一軀，造四十九尺神幡一口，為法界眾生，一時成佛。

按：S.4570《優婆塞戒》卷第六，及 P.2276《優婆塞戒經》卷十一，尾題有與 S.4162 相同的題記，當是楊維珍為亡父所抄同一部《優婆塞經》的各卷。

散 0779《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零本一卷，題記：

大唐開國武德二年(619)四月八日。

P.284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尾題：

景雲二年(711) 四月八日，孔道生妻張為男(孔)思忠敬寫。

散 0810《般若波羅蜜經》題記：

唐寫開元五年(717 ) 四月八日寫了。

S.1911《佛說阿彌陀經佛經》，一卷，尾題：

開元八年(720) 四月八日清信弟子孫思忠寫了。

按：北 0178 (秋字 097)《佛說阿彌陀經》一卷、北 0166 (河字 076)《佛說阿彌陀經》一卷、北 0150 (薑字 057)《佛說阿彌陀經》一卷也有同樣的題記。

P.2374《佛說天請問經》，尾題：

維大周顯德六年(959) 四月八日，瓜州承典禪院禪師惠光，發心敬寫《延壽命經》、《續命經》、《天請問經》三卷，計寫四十九卷。

由上所舉敦煌寫卷題記，可見在四月八日抄造佛經的活動，從魏晉以來，直到唐、五代、北宋，不論敦煌地區或中原地區，都相當風行。抄造佛經的身份，上自皇后、下至平民百姓，僧俗男女均有。從題記中的願文來看，有為亡父、有為亡夫、有為亡兄，更有為法界眾生來薦福的，也可為自身及眷屬祈福。抄造經典具有無量功德是佛教所鼓吹的，抄造經典的時間，是無時不可的。然而選在四月八日，當然是更具有紀念佛誕的意涵，其宗教文化意義也更行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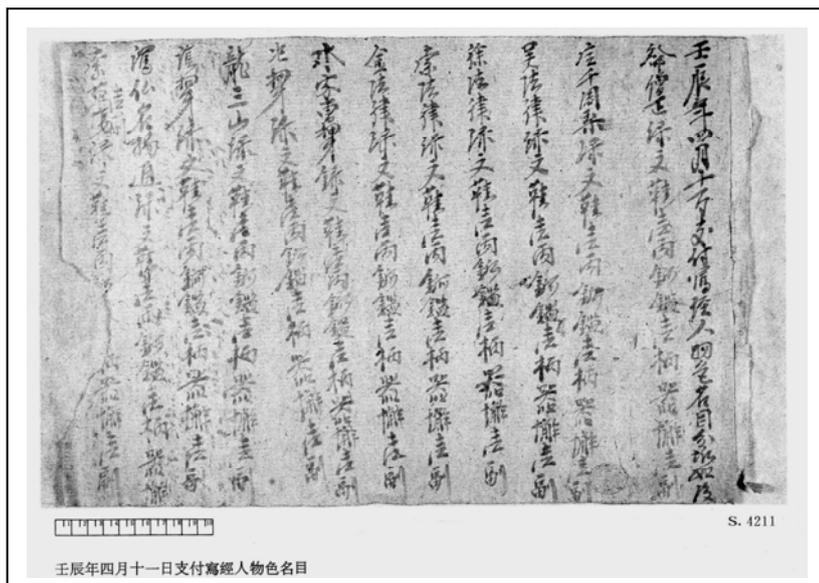
上列四月八日所抄造的佛經除了一般的《般若波羅蜜經》、《佛說阿彌陀經佛經》、《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大乘經典外，其中以 S.4162、S.4570、P.2276 等楊維珍為亡父所寫的《優婆塞經》、《灌頂經》、《善惡因果經》、《太子成道經》等與四月八日佛誕關係密切外，同時造四十九尺神幡一口，也是佛誕日祈求延壽續命的特殊意涵。另外，P.2374 瓜州承典禪院禪師惠光，發心敬寫《延壽命經》、《續命經》、《天請問經》三卷，也是具有延壽續命的祈求，特別的是「計寫四十九卷」，前舉《灌頂經》卷十二，也是強調「六時行道，四十九遍」、「神幡五色四十九尺」、「然四十九燈」。顯然「四十九」是具有續命的神秘數字。

從上列寫經題記，可見四月八日抄經活動的盛行，抄經的種類繁多，抄經的數量卷帙也不少，一般不易完成，更有不能勝任抄經工作的。敦煌寫本中保存有當時敦煌地區抄經費用的相關資料，如 P.2931《寺院帳目》：

寫《大般若經》一部，施銀盤子叁枚，共三十五兩，麥壹百碩、粟伍

拾碩、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寫經，謹請炫和上收掌貨賣，充寫經直。  
紙墨筆自供足，謹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華□。

康秀華將物品施入寺院，請炫和上代為變賣以充當寫經費用，請人代為抄寫《大般若經》一部。又 S.4211「壬辰年四月十一日支付寫經人物色名目」，更保存有歸義軍時期支付寫經報酬的一份清單：



從這些資料看，寫經人有僧官、也有衙府的一般官吏，這是他們在完成寫經任務後所得的報酬，從時間看此次寫經當與四月八相關。由於信眾可望能有抄經功德，除了有能力親自抄寫外，更多的是出資請人代為抄寫，因此，形成一種因信仰而產生的新興文化事業，我們從敦煌文獻中發現有各種以代人抄寫為生或貼補生活的抄手，這也就不難理解。

## 五、後語

透過特定節日的慶祝以凝聚信眾，是宗教信仰常見的手法。在漢傳佛教中，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地藏菩薩、普賢菩薩、文殊菩薩等等的紀念日都是佛教信眾的盛事。其中特別是教主釋迦牟尼佛的誕辰、出家、成道、涅槃等，更是佛教徒公認的重大節日。

每年四月八日的佛誕日，在同一時間，選擇一個共同的空間，不論僧俗、不論貴賤，透過共同的宗教活動，來展現共同的信仰，發揮群體無比的感染力。一時蔚然成風，發展為一種宗教文化，更進而形成為民族的信仰民俗。

寺院是佛教的實體，唐代佛教寺院作為一個兼具宗教、政治、經濟等職能的社會組織，發揮了多方面的功能，尤其在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上，堪稱是當時社

會文化中心。佛教傳入中國，各地寺院逐漸擔負民間文化活動的主要功能，寺院也成為救濟的社會福利場所。寺院的雕塑、壁畫等建築藝術，與齋會、慶典成為民間聚會與社會教化的主要活動。

唐五代敦煌地區四月八日佛誕日的轉經法會、齋會與浴佛活動，其參與者上至政府官員，下至平民百姓，不僅有宗教信仰的儀式內容，也伴隨各種娛樂、教化、藝術活動的產生，突顯出以寺院文化、功能為中心擴展而成的社會文化現象。

我們從敦煌文獻中的寺院文書，看到了唐五代敦煌地區與中原地區四月八日佛誕節，僧俗宗教活動的具體面貌，也窺見了寺院活動與文化部份面向。從群體的「廣會聖眾俗，設齋供養」，到象徵再現佛誕與佛懷念之情的「浴佛」活動的進行，以及個人「造幡」、「寫經」等薦、亡祈福等佛事，進而衍生出寺院代為安排分配寫經任務與報酬等，一種新興宗教文化事業的產生。更可見寺院在敦煌地區的重要功能與敦煌寺院文化的特殊現象。